

四川保路風雲錄

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四川保路风云录

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汇海 吴长显

封面设计：邱云松

四川保路风云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战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27千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70册

书号：11118.82 定价：1.06元

前 言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我们征集、选编了有关辛亥革命回忆录专辑，主要叙述四川保路运动的史实，着重纪事翔实。在人物事迹中，个别人物的活动不在四川，但属四川籍，也收入此辑。本辑由何盛明同志主编，参加编辑的人员有：胡临聪、金振声、廖铭吉、高思伯、陈雁翥等同志。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二日

目 录

四川辛亥革命述概·····	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军事政治组	1
辛亥革命前四川灾情·····	四川省档案馆	23
由暴风雨前夕到革命大波·····	李祖桓	29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	林冰骨	40
哥老会的缘起与清王朝对它的镇压·····	侯少煊 雁 秋	45
立宪派与士兵运动和哥老武装·····	李明新	57
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成都外事的记录·····	杨少荃	60
站在革命前列的学校师生		
由读《新民丛报》到读《革命军》·····	张伯言	63
重庆早期的革命思潮和组织·····	陈新尼	64
高等学堂学生与同盟会及实业团·····	邓胥功	66
成都学生两次罢课亲历·····	宁芷村	68
宜宾学生参加保路运动亲历·····	赵镜泉 吴特昌	69
永宁中学堂与同盟会·····	李铁夫	71
小学生江边传木牌·····	罗任一	72
川西风云与英勇学生军·····	王蕴滋 张汶杰	73
各界妇女纷起斗争·····	高思伯 尹剑秋 林希之	75
川西同志军首举反清义旗·····	侯少煊 廖铭吉 林希之	78
广汉武装起义与侯橘园		

侯国治率同志军攻占绵竹、安县	
新津同志军的辉煌战绩	
温江起义战斗	
同志军攻占新都、新繁	
孙泽霈起义师围攻成都	
辛亥革命时期的彭县	
邛州保路同志会和周鸿勋武装起义·····	方瀛西 95
战斗激烈的雅安光复·····	政协雅安委员会 98
革命党人在西昌起义的严重教训·····	胡恭先 104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奴	
隶制的英勇斗争·····	钱安靖 周锡银 108
由西安革命活动到川南各地起义·····	杨光蓉 122
清末内江社会情态及辛亥反正经过概略·····	韩文哇 133
辛亥革命自贡独立前后述概·····	殷学渊 139
辛亥威远保路同志会的武装斗争·····	政协威远县委员会 147
宜宾起义前后·····	熊克武 157
犍为光复与胡潭·····	宁芷村 159
合江围城战与黄方被滇军杀害目击记·····	穆济波 162
高亚衡、李鸿钧与涪陵光复·····	高兴亚 165
漫谈哥老会与重庆老关口之占领·····	傅渊希 172
辛亥重庆光复点滴回忆·····	温少鹤 182
辛亥革命在綦江·····	政协綦江委员会 188
嘉陵、乌江浪涌夔门·····	张汶杰 193
辛亥保路斗争在达县·····	瞿传珉 朱澍辰 伍伯伦 195
徐云程 谢永璠 梁警庵 口述	
刘海扬整理	
大竹孝义会震撼川东北·····	政协大竹县委员会 197
大竹书报社的革命活动·····	政协大竹县委员会 199
东乡光复记·····	石体元 201

蜀军政府成立前后·····	向 楚 朱必谦 石体先 陈农友 黄应乾	213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	王右瑜	237
川南起义到泸州独立·····	杨兆蓉	243
广安己酉起义及蜀北军政府成立纪实·····	贺公藩	247
记辛亥保路重心人物罗纶·····	黄 绶	252
张森楷挺身斗赵督·····	刘放皆 唐唯目	256
雷铁崖革命事迹·····	雷民心 雷导衷 雷承道	260
龙鸣剑及其《雪眉诗集》·····	雷贞干	263
辛亥革命与女杰杜黄·····	舒君实整理	272

四川辛亥革命述概

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政治组

七十年前（一九一一年）四川发生的保路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伟大群众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最突出的事件。这场运动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开端，发展成为全川范围的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它以加速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的历史功绩彪炳于史册。孙中山先生曾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61页）这场运动以磅礴的气势，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专制统治，敲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丧钟。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

一、二十世纪初四川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起义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完全跌落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清政府公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卖国，甘当走

狗。帝国主义各国则“托保全之名，行灭国之实”，通过清政府全面加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为了进一步输出资本，划分“势力范围”，变中国为殖民地，列强掀起了掠夺中国路、矿权利的狂潮。

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尤为列强所垂涎，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曾透露出列强的侵略野心：“四川古称天府，浴天然恩惠，物产丰饶，且地下包藏无限之宝藏，故欧美人无不垂涎。……四川者不可不谓吾日本之好个活跃场。”（铁崖：《警告全蜀》，载《四川》杂志）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各国正在四川抢夺铁路、矿山，开办工厂、洋行，大量输入商品，实行无孔不入的宗教文化侵略。洋货充塞四川城乡市场，以重庆一地为例，一九〇〇年，洋货进口总值为12,917,081两，一九〇三年激增至18,073,339两。对四川采矿权和铁路权的争夺更为剧烈，到一九〇四年，“吾蜀矿务落于他人手者已过半矣。”（《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1页）

帝国主义在四川疯狂侵略掠夺的同时，清王朝也加紧了对四川人民的残酷压榨。仅庚子赔款，就给四川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一九〇二年起，四川每年要摊派所谓新案赔款220万两，使四川的“新捐输”加上原有的“捐输”“津贴”，苛派比“正额”多至十倍。清王朝为进行垂死挣扎，实行旨在强化国家机器的“新政”，更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四川已是无物不捐，捐上加捐。婚姻收“定税”，娼妓抽“花捐”，四川总督奎俊，“见农民入城担粪，即抽粪税，每担取数文，每厠月取数百文，税至于粪，真无微不至。”（《四川革命书》丛刊本，载《辛亥革命》（二）第311页）

四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一九〇六年，四川留日学生描述了四川社会的残破惨景：

“四川虽以殷富闻，自咸同以后，地丁而外，津捐各款，名目繁多。近年来，兴学、练兵、办警察、筹赔款，竭泽而渔，势

已不支。而外洋货物，充塞内地，工徒失业，农商亦因此受亏。生计艰难，迥异昔日，疮痍满道，乞丐成群。节衣缩食，卖儿鬻女，而不足以图生活、供丁赋者，比比然也。凡我川人，环顾故乡族友，岂非一落千丈，十室九空，富者渐贫，贫者且死乎！”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4页）

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陷入失业贫困的悲惨境地，就是一般工商业者乃至中小地主，亦感到每况愈下的威胁。

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侵略掠夺，清政府无止境的苛税盘剥，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四川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一有倡议发难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势。”

（《光绪二十八年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折》，载《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第210页）反帝斗争已经同反清斗争联系起来，“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响彻全川，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席卷巴山蜀水，打教堂、杀教士、仇洋货、抗税捐、围攻县城、包围省会、打击清军的斗争，屡仆屡起，历久不衰。到了一九〇五年，四川更是“人心浮动，各处堪虞，仇教、仇洋之广告，几乎无地无之。”（四川大学藏巴县档案《义和团专卷》）键为群众二万人奋起仇教和反对官府勒索，川边巴塘藏民聚众三千，围攻衙署，烧毁教堂。一九〇七年，平武县以谷捐苛扰，激成民变。成都也发生了满族群众的骚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初步开展了。一九〇四年，成都机器局全部工人六百余人罢工，反抗工头克扣工资。一九〇八年，自贡盐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近二万人罢工。城市贫民也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工农劳动群众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酝酿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四川地处西南，交通不便，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比沿海省份约晚二十年，而且还微弱得多。但由于外国资本势力的深入，严重地破坏了四川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四川的民族工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八八九至一九一一年间，成都、重庆、万

县、合川、三台等地先后开办的纺织、缫丝、印刷、火柴、电灯、玻璃、煤、制革、造纸、面粉等工厂企业约68家左右，其中重庆电灯公司、成都启明电灯厂等企业的资本达到了30万元。但是，四川民族资本刚发展时，帝国主义已从各方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四川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制下，困难重重，前途短狭。四川的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威胁的严重存在，发出了慨叹：“重庆自甲午马关订约，商埠大开，交易日盛，宜乎商务振兴，大有起色矣。而卒之市面年逊一年，倒塌迭见，外人货物充盈，莫筹抵御之策。”（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十《广益丛报》）他们为了切身利益，反抗帝国主义的要求不断增涨，力挽利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种呼声反映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

二十世纪初年，四川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在四川资产阶级的倡导下开展起来，它是四川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收回利权的斗争从粤汉铁路发端（一九〇四年开始）。一九〇七年形成高潮的江、浙人士争取收回苏（沪）杭甬铁路的斗争更为激烈。这两次斗争给全国的收回权利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在全国收回利权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四川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特别引人注目。

一九〇四年，英国侵略分子立德乐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江北煤铁矿务合同》，夺得四川省江北厅煤铁矿的开采权和运煤短途铁路的修筑权。次年，立德乐组成“华英煤铁有限公司”，着手大肆侵占土地，与当地绅民发生冲突，引起群众的激烈反对。江北绅商集资组成“江合公司”，与“华英煤铁有限公司”分庭相抗，进行交涉，力争收回路矿权利。英国侵略者要尽花招，横蛮抵赖，终因理屈词穷，更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华英公司于勒索白银22万两的高价后，不得不将江北煤矿权“顶卖”给“江合公司”。这场斗争，对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川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围绕川汉铁路修筑权而出现了空

前的高潮，迅速发展为全川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各国历来把掠夺路权作为扩大侵略、输入资本、宰割中国的重要手段。从十九世纪末年起，帝国主义就展开了争夺中国铁路建筑权的激烈竞争，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更刮起了铁路投资的狂风，中国大部分铁路干线的修筑、经营、管理权先后落到帝国主义的手中。据统计，一九一一年中国共有铁路9,618.1公里，帝国主义控制的铁路即达8,952.48公里，占93.1%（《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铁路权的得失，已成为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大事。

由于四川僻处祖国西南，交通不便，帝国主义不能畅通无阻地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因此，掠夺川汉铁路建筑权，就成为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侵略计划。一八九六年，英国资产阶级学者肯德生在所著《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即明白透露：英国的计划是建筑一条由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万县而达成都的铁路，要使“条约港重庆”“成为远东的圣路易”，这是因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一八九七年，法国印度总督杜美主张：法国由劳开至云南的铁路，只有将它展至人口稠密的四川省，才会显出它的真正价值；该铁路的目的地应该是该省省会成都，从这里再建筑一条铁路以达扬子江边的重庆。于是英、法首开夺路之争，美、德、日等国接踵而至。到一九〇三年，帝国主义各国“均以借款造路为请”，“蓄意覬覦”，“计求强取，百端纷扰。”因此，围绕川汉铁路的斗争就成了四川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焦点。

四川资产阶级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绅士倡导自办铁路，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留日学生）尤为激烈，以“四川铁路入他国手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民永服属于他国之日也”（《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0页）的呼声，唤起川人的注意。一九〇三年，新任四川

总督锡良在群众的压力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次年，设置“川汉铁路公司”于成都。

“川汉铁路公司”的成立，立即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英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川汉铁路所需款项，均应依一九〇三年奕劻所允由英、美借贷；法国领事向锡良先提出包揽川汉路工款的要求，当公司以铁路“一切均系自办，尚无须借助于人”的条例严词拒绝后，又致函公司督办，以“将来如何结局，……惟贵督办是问”等词威胁恫吓。一九〇五年，英、法勾结，派英帝华中铁路公司代表濮兰德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代表贾斯纳来华游说官僚张之洞，并在北京鼓动中国全国铁路应由中央统一经营。其意在借清廷之手夺取川汉铁路。

建筑铁路需要大量资金，资产阶级苦于资本奇缺，无法单独完成修路任务，于是用“田亩加赋”的办法筹措资金。四川留日学生基于爱国热忱，一面呼吁“自力更生，齐心修路”，一面决定“自认股款三十余万两以为先导”。（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九〇五年一月，川汉铁路公司议定集股章程，明确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非中国人股份，概不准入股。”“股票转售与人……惟只售与中国人，倘转售或抵债与非中国人，本公司概不承认，股票作废。”一九〇七年三月，《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重申：“公司专集华股自办，无论整股零股，均惟华自购，不附洋股。”并针对外国强派工程师提出：“延本国人作为总工程师，其应聘东西洋各国人，均由本公司商同总工程师妥立合同，规定权限，仍归公司监督，若应聘人怠于职务，本公司可随时知照总工程师辞退。”这些规定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针锋相对的，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性质。

股东来源虽有“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四项，但其中主要是“抽租之股”，“公司所入，独恃人民租谷为大宗。”（《四川川汉铁路大公司纪事》）抽收

的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的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其有佃户押重租轻，及债户以租抵利者，但有租可收，数在十石以上，均一律照抽，不专抽自业主。”还规定“盐茶商业……尤应认购多股，赞兴轨政。”因此，全川七千万人，不论贫富，差不多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联系。而出力最大，负担最重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抽收租股，每年虽有确定二百余万之收入，然此乃以压迫之力，取诸一般农民者。”（《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当时四川劳动人民已挣扎于饥饿线上，抱着不甘受帝国主义奴役的爱国热忱，含辛茹苦，勉力缴股。一首《来日大难歌》写道：“自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的是庄家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为的是哪一件？怕的是外国人来占路权。”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一条川汉铁路如脉络血管把全川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四川人民早就渴望改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实现交通运输近代化，以便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四川留日学生把四川人民的这种强烈愿望表达了出来：“况我中国者，民庶之富，物产之饶，甲于大地者乎！况我四川者，民庶之富，物产之饶，甲于中国者乎！……而吾蜀道之难，著称于全国。其与他省交通也，陆则蚕丛鸟迹，水则惊流激湍，举国以畏途目之也，数千年矣！今若一旦安轨飞行，瞬息千里，凡我邦人，有不趋之若鹜者耶？”（《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页）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之初，虽然股款来自民间，也加上公司名义，但实际是官办，完全由锡良为首的官僚所把持。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四川留日学生上书锡良，主张铁路由官商合办，并请厘订股东权利义务以著大公。铁路公司在一九〇五年改成官商合办，但绅董“不得干预本公司用人行政之权。”一九〇六年，四川留日学生又联名指责官府把持铁路公司，要求把

川路全归商办。一九〇七年，官商合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改成了“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自此立宪派士绅掌握了铁路公司实权。

在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持下，川汉铁路从一九〇六年起开始勘测路线，决定先由宜昌动工。一九〇八年，聘请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一九〇九年，宜昌设工程局，动工修筑。川汉铁路的自办开工，给帝国主义以当头棒喝，粉碎了帝国主义“此路之结果，非得外国专门家与财政之资助，决难望其成就”（《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00页）的谬论，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气魄和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英雄气概。帝国主义在川汉铁路开工后，更加疯狂起来，大肆造谣诋毁，说什么：“国家将建筑并设立铁路之权，归于各省自办，真政府之一大错误。”“川路不借外款，不雇外国技师，现在居然开工，中国前途叵测，环球列强均当留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99~100页）同时加紧同清王朝勾结借款，“恫喝要挟，无所不至”。张之洞遂于一九〇九年六月七日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共借550万英镑，规定粤汉路用英国工程师，川汉路用德国总工程师。英、法、德三国侵略强盗初步达到了目的。

美国不甘向隅，亟图染指，遂借口清政府在一九〇四年曾许以川汉铁路投资的优先权，要求加入。于是美、英、法、德四国开始了分赃谈判，成立了四国银行团的协定。一九一一年初，买办官僚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后，清廷在帝国主义唆使下，先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继之强行接收各省铁路公司，五月二十日，便与美、英、法、德帝国主义签订了粤汉、川汉路借款合同，规定总额为600万英镑，而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以及允许四国享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腐朽透顶的清政府就这样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进行了公开大拍卖！连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王文韶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界

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奏稿要录》）清王朝开门揖盗，祸国殃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恨，于是，一场以湖南率先的保路风潮倏忽间席卷了长江中游。

二、四川保路运动

清朝的铁路国有政策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了四川人民的无比愤怒，“函电纷驰，争议豁然”，掀起轩然大波。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的保路斗争勃然兴起。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人士发动和领导的，他们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士绅的利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有重要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立宪派要求参与政权以维护、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主张君主立宪，国会早开，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制度。清廷为了拉拢立宪派，一九〇九年设立了“四川咨议局”，成为立宪派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任正副议长。立宪派还创办了《蜀报》，宣传君主立宪，要求庶民参政，同时也发动了立宪请愿运动。

然而，一九一一年五月，清廷“预备立宪”的闹剧闭幕，“皇族内阁”粉墨登场，使立宪派参政的政治幻想化为泡影。

六月一日，盛宣怀、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60页）这就更直接侵犯了立宪派的切身利益，使立宪派同清廷之间的矛盾加深，裂痕扩大，从而铤而走险，决定利用群众的爱国情绪，逼迫清廷让步。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七日，成都各团体二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讨论合同对于国家与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

（《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奏稿要录》）当场决定组织四川

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指出：“我新内阁（指皇族内阁）之野蛮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莫斯为甚”，“政府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9号）提出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并通知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派出讲演员分赴各地进行宣传，发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扩大运动的影响。

控制保路运动领导权的立宪派，在发动、组织群众保路斗争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始终把“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两句从光绪上谕中摘来的话作为保路的口号、纲领，既使保路斗争披上合法的护身符，同时也反映出这是一场民族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争夺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立宪派通过宣传讲演，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清朝卖国卖路的罪恶行径，他们发出鼓动人心的责问：“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夺路夺款，又不修路。”“夺诸国民，送诸外人，是谓国有！是谓政策！”大大激发了各阶层群众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愤恨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热忱，这时，各县和各行各业保路同志会纷纷成立，保路运动迅猛发展。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爱国的热忱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起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孤立清王朝的积极作用。

川汉铁路的存亡，同全川各个阶级，包括数量很大的农民在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敲骨吸髓、肆意剥削之下的四川劳动人民，茹苦含辛，集捐筑路，盼望修好中国人民自办的铁路，反对外国的侵略，改变四川交通闭塞的状况。对于清政府夺路夺款的害国行径，他们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广大群众认为：“铁路国有”政策无异是“抢我们财产，夺我们利权，摧残我们做亡国奴，逼我们永远煎熬”，“卖路是卖国的引线，重债是亡国的见端。”（《江北县志》手抄本大事记）因此，保路运动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